

海上记忆

70年前,人生在提篮桥转折

■ 本报记者 沈轶伦

到了1949年初,在上海,形势已经相当清楚。共产党要来了。

在上海市银行位于提篮桥的第五办事处里,小职员吴承惠的日常还是一如既往。每天下午三点,银行关门停止营业,内部结账,大家一直忙到下午五点后。有一天下午,他一边看账,一边忽然心有所感,叹着气大声说:“将来我大概不会再做这些事,只好去蹬三轮车了。”大厅里一起工作的同事听了都笑起来。一位副主任过来说:“将来你可以做的事多了。”

到了5月,一天,银行的小职员们照旧做着手头的账目,做完后,一起聊天。忽然,一位向来打扮很时髦的女同事开口说:“共产党明天就要进城了。”在座的同事都有点惊讶,心想她怎么会知道呢。

事后,吴承惠才知道,这位女同事的丈夫就在解放军的队伍里面。果然,解放军进城几天后,她就和丈夫一起来银行向大家辞行。这位女同事和丈夫一起,穿了黄绿色的军装,一扫平日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上海解放当天,一早吴承惠穿上一身灰色呢子的新西装出门。等到了街上,看见有些解放军战士扛着一团电线走来走去,神色和悦。一刹那间,他觉得自己衣服和街上的情景不太协调。新的时代到来了,自己未来究竟去哪儿,前途在哪里呢?一阵迷茫。

不久,上海市银行被接收,同事大多已被分配,吴承惠留下负责清理工作,更觉惶惶。但因为负责清理工作,所以吴承惠到了九江路总行上班。一天,他在路上忽然遇见了老朋友董乐山。后者告诉吴承惠,1949年后的上海新出版了一张小报,叫《大报》,陈蝶衣正在为这份报纸吸收记者。“你有没有兴趣去?”

想到又能做自己喜欢的写稿工作,吴承惠没有多想,立即答应了。时局变化,上海市银行没有了,但小职员吴承惠没有去蹬三轮车。上海,也就此多了一位新闻人。

提篮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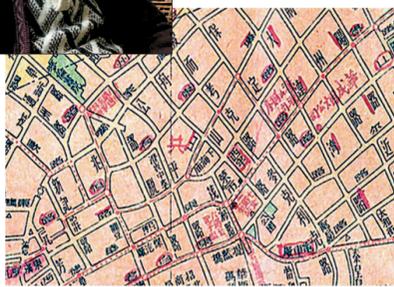
提篮桥,是吴承惠曾就职的上海市银行第五办事处所在的地方。这里,是沪东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

资料显示:早在清朝嘉庆年间,本地居民在下游庙附近的下游浦上兴建一桥,名为提篮桥,该地因此得名。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该地被划入上海租界,由于区内有香火鼎盛的下游庙和通往浦东的轮渡,逐渐成为苏州河北的主要集市之一。租界当局在此围田造屋,填浜筑路,辟建码头。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茂海路(今海门路),汇山路(今霍山路)三路交会处,逐渐成为商业繁荣地段,菜馆茶楼、咖啡酒吧、五金器材、西服及生活服务业等相继兴盛。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启用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俗称提篮桥监狱),更使“提篮桥”三个字市民皆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篮桥地区成为东方绿洲,容纳了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居住。犹太人的到来,为此地带来西餐、服装、皮革、五金等商店,也带来酒吧、夜总会、花园等娱乐场所。舟山路、霍山路一带,成为带有欧陆情调的商业街,当时上海新闻报刊称之为“小维也纳”。

1947年夏天到1949年的夏天,吴承惠每天到提篮桥地区,去银行做一份职员的工作,被父母长辈视为捧牢了“金饭碗”。但其实,吴承惠私底下的另一个爱好,更得他个人喜爱,也在他日后的人生中,成就他一生事业——写东西。他日后还会来提篮桥,却不再是银行职员,而是记者。更多人知道的是他的笔名“秦绿枝”。



吴承惠,1926年出生,1949年进入上海新闻界,先后在《大报》《亦报》《新民报》《新民晚报》工作。“秦绿枝”是他常用的笔名。



1949年前虹口提篮桥区域图



上世纪40年代的一条提篮桥小街 资料图片

当时的上海市银行在市区各重要商业中心设立分行,名为办事处。提篮桥也是其中之一。1947年夏天到1949年的夏天,吴承惠在上海市银行位于提篮桥的办事处找到一份职员工作,被父母长辈视为捧牢了“金饭碗”。

但其实,吴承惠私底下的另一个爱好,更得他个人喜爱,也在他日后的人生中,成就了他的一生事业——写东西。

小报

吴承惠的父亲也曾为银行职员,收入在当时还算可观,但因为子女众多,因此生活只够温饱。吴承惠高中没毕业,就出来做事。虽然学历不高,但他生性喜爱文艺,看报、自学,很快开始投稿。

当时,吴承惠的一位同性朋友,在《世界晨报》承包一部分版面,谈股票行情。他负责写稿,就让吴承惠去报社编辑排版,虽然不算正式工,但有时也以记者的名义外出采访新闻。他很快发现,自己对这份工作得心应手。不过,《世界晨报》销路一直不佳,副刊编辑换过好几个人,最后请刚由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李君维编过一段时期,但也没有很大起色。不久《世界晨报》停刊。虽然出师不利,但好在吴承惠本来也是以玩玩的心态给报社做事,况且,通过写稿,他认识了冯亦代先生。

吴承惠印象里,当时上海的小报很多,水平参差不齐,虽然品种五花八门,但内容往往大同小异。加上时局变化,办报的人往往并非一流富商,经济常常出现困难,因此每家小报

的寿命都不长,有的甚至很短。在吴承惠的回忆里,当时的记者队伍里,很少有正宗的受过大学系统训练的新闻系毕业生,银行职员、店员,乃至教师、中学生等,各类出身的人都有。冯亦代先生原在中原公司当高级职员,也在《联合晚报》编副刊,正是在他的介绍下,吴承惠得以向《新民报》《联合晚报》投稿,认识了不少文化人。冯亦代一有空,还经常约青年人聚会、喝咖啡,包括吴承惠、李君维、董乐山、何等为。

1949年夏天,吴承惠为银行做事,在九江路上偶遇董乐山。也许是冥冥之中,报业也想念这个年轻人,将这个带到他面前。陈蝶衣当时想吸收董乐山为《大报》记者,但董乐山想去北京新华社,就将职位转介绍给了吴承惠。就这样,吴承惠正式进入新闻界。

采访

1949年后,很多小报都停掉了,最后批准出版了两张新的小报,即《大报》和《亦报》,宣传口径以《解放日报》为标准,重要报道送到《解放日报》去审。那时办报都守住两条底线:一是歌颂新社会,二是痛恨旧社会。而在发行方面,最初由发行商自行解决。当时报纸发行集中在望平街(今山东中路),《大报》由一位姓田的人负责发行,《亦报》由一位姓武的人负责。他们原来就是小本经营的发行商,当时发行得好的,也就两万多份。

《大报》临时在福州路杏花楼对面一间石库门内办报,不久搬到河南路九江路口一幢临

街房子里。吴承惠在报社负责跑社会新闻,常去的是浙江北路上的上海市人民法院和几个公安局,看人打官司,或者盯名人结婚(当时结婚要去法院登记)。一次,吴承惠打听到一位知名女演员要结婚了,连忙带着摄影记者去法院婚姻登记处抢拍到了新人。报道见报时,还特意加了花边。不久,另一桩命案,让吴承惠又有机会回到熟悉的提篮桥地区。

原来,当时一位女演员被丈夫杀死在自家浴缸里,丈夫的律师带着杀人犯去警察局自首。案件事实清楚,但对于要不要采纳自首情节从轻发落,多有争议,因此一审再审。最后,杀人者还是被判了死刑,将要被执行枪决。吴承惠去提篮桥监狱里观看执法。这是上海解放后第一次执行死刑,枪手们都是很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因此也有些紧张。等回到报社,吴承惠才发现,自己的衣服袖子上似乎也沾染了一点血迹。

第一年,两张报纸的销路都很好,广告也很多,创刊一周年的时候,两张报纸在电台上做了三天的特别节目,很有声势,邀请上海的京剧、越剧、沪剧、评弹、滑稽界的名角到电台来演唱,听众要听什么人唱什么戏,可打电话来点播,同时可以订一份报纸。后来报纸慢慢不景气。虽然有周作人、许姬传等名家为《大报》写稿,但渐渐《大报》呈现颓势,不久停刊,并入了《亦报》。1952年后《亦报》部分人员并入了《新民报》,即《新民晚报》前身。

在新民晚报,吴承惠继续写稿,他有了一个常用的笔名“秦绿枝”,至今笔耕不辍。那些在提篮桥的银行办事处为记账而动笔的日子,已经遥远如一个旧梦。

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数百亿元投资、数百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要在3年内完成,近似天方夜谭,但我们就是这样创造了一个令全世界称道的上海世博会。”上海市的领导很骄傲地对我说。

“建筑任务是2007年下达的,规定必须在2009年底完成场馆和调试、验收各馆的布展,其实只有两年不到一点时间,许多场馆真正建设期甚至是从2009年初才开始的……”上海世博会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丁浩说,他是从市建交委副主任的岗位上被市里抽调到世博会主管整个世博园区的建设工作的。“任务压下来那会儿,真是有点愣了,过去我做过很多工程,多数是单体项目,哪怕许多技术在国际上都是一流的,建设再困难,它也是单体的。可世博不一样,它是一个城市概念,整个世博工程项目中,涉及的工程类别有公路隧道、地下轨道,还有码头、公园,甚至还要有雨水泵站、污水泵站、桥梁道路等等,再加上永久性建筑和临时性的场馆,中国和外国,都有不同要求,可谓庞杂无比!”丁浩说:“光永久性建筑的代表作是‘一轴四馆’,包括了‘中国馆’、‘主题馆’、‘世博中心’、‘世博文化中心’和一条几公里长的世博轴。仅这5个建筑面积就达100多万平方米,等于6座人民大会堂的体量,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要求还远比人民大会堂那种单体建筑要高得多!再算上世博村、城市最佳实践区,体量之大超乎想象。我接手后的第一感觉就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在上面要求的时间内完成。但上海的要求又是:时间是死的,活儿必须提前完成,且要求和质量一点也不能含糊。最后一句话是:完



何建明 著

成不好,出了质量问题,拿你丁浩是问!”丁浩苦笑着说:“没辙!”

一千多个项目,几万建筑大军,最多时超过10万建筑工人在工地。假如再算上其他装配人员和志愿者等等,少说也有20来万人。但到当地的工地走一走,发现竟然在外面看不到几个人……多是室内功夫!”丁浩说。

既然是建筑,那我就找“建”的人来谈谈他们当时是如何完成这些“不可能完成”的美轮美奂的世博园建筑的——

第一个“建”是袁建国,听名字好像他就是来“援助”建设国家项目的。袁建国笑了,说可不是,我学的是石油专业,但一生干的工作全都是国家的建筑项目,应该算是“援建”了!他是上海市第二建筑公司第一分公司的副经理。接受的世博建筑任务是142662平方米的“主题馆”。

“到现场后,才知道我们施工的时间只有22个月,其中有一个将近6万平方米的深基坑。按惯例,像这样一个需要深挖10米的大基坑,仅围护结构就得用12个月。全工程22个月怎么完成?只能是动足脑筋,想尽办法,干足实劲!”袁建国说,他们采取了大面积分块进行施工,29区块同时进行,场

馆外面看不出动静,里面我们干得热火朝天。“那可真叫‘热火朝天’!29个施工分队,相互比、学、赶、帮,流动作业,24小时不歇班。哪个班组落后了,哪个班组长在前面了,看得清清楚楚,看得越清楚,他们就会争着抢着当先进!”袁建国说,当初每回领导来工地,就问我,建国啊,你这工程能完成得成吗?我指指身后的热腾腾的大基坑,就说:我的这些人再完不成的话,就找不出其他能完成的人了!领导们拍拍袁建国的肩膀,说:有你这话,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2009年9月28日,在袁建国的带领下,建筑工人们所建设的“主题馆”竣工。他站在那座在绿色柔光照射下变得梦幻一般的主题馆面前,张着嘴不停地笑,笑着笑着,竟然发觉脸颊上尽是热泪……

第二个“建”叫陈建秋,老同志了,1944年出生的“老建筑”。在接受世博工程之前,刚刚从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工程下来。“本来再等一年就办退休了,可领导说:你再干一个工程吧。所以我就到了世博工地,说你经验丰富,做个永久性工程吧,叫世博文化中心。”文质彬彬的陈建秋,像个教授,根本不像一生搏杀在建筑工地的人。

现在那个往上上看像飞碟、从上往下看像贝壳的世博文化中心,与中国馆毗邻相伴,成为上海新建筑的一大景观,十分抓游人之眼。但陈建秋刚到工地时,却连设计的图纸都没有成形。开始只听说是建个“演艺中心”,后来听说世博会的开幕式要改在这个演艺中心举行,于是“演艺中心”也就变成功能更复杂、要求更高的“世博文化中心”了。除举世瞩目的世博会开幕式要在此场馆举行外,184天的参展期间每天要在这个中心安排两场演出,6个电影院全天候放映,而且是全部免费的。此外还有餐饮、音乐俱乐部、剧院等等。

2007年12月30日,“世博文化中心”正式开工。

“但实际上除了打几根桩、搭了一个台外,开工典礼结束后什么都不动,因为场馆的设计图还没有下来,到底要个什么样的开幕式,坐多少人、用多长时间等等,还都没定下来。所以只能等……”陈建秋说,世博会的工程最难的是时间,可对文化中心工程来说,最难的是要把浪漫的设计图纸,化为现实物体。设计师笔下的“飞碟”形文化中心场馆很美,用三维技术绘制出来的效果美得找不出毛病。可我们施工的要把它三维技术下的图纸建成与之相符的物体,难度就比一般建筑要高出几倍。

“开始我一直担心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工程完不成,大家却非常支持我,说‘一定帮你完成好’!这给我很大鼓励。”陈建秋是建筑战线上的“老将”。

老将出马,一个顶仨。果不其然,他领导下的施工队伍,在极短时间内,干得井井有条,又快又好,尤其是在建“飞碟”形建筑的过程中,克服了诸多困难,将设计师笔下的“三维蓝图”,活脱脱地搬到了黄浦江边,就是那个如今人见人爱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

(四十)

连载

消费 市场 专版

刊登内容:

- 金银首饰
- 百货卖场
- 休闲旅游
- 儿童用品
- 食品餐饮
- 建材装潢
- 体育健美
- 超市促销
- 家具厨卫
- 家用电器
- 婚纱摄影
- 品牌人物
- 酒类饮品
- 医药保健
- 教育出版

电话: 021-22898552